

大尺度的“税收优惠”该退场了

邓海建

12月9日，中国政府网刊发了《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要求全面清理已有的各类税收等优惠政策。统一税收政策制定权限，坚持税收法定原则，除依据专门税收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税收管理权限外，各地区一律不得自行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每日经济新闻》12月10日）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财税对市场的调节可以说是最直接的方式。尤其是在招商引资的狂飙之年，哪个地方没几项大尺度的税收优惠政策，好像都不好意思去台

推销自己。这些年，一些地方的税收“土政策”，几乎到了撕破脸恶性竞争的地步：为了示好于资本要素，全然不顾财政支出的风险。此前，甚至还有招商标语雷倒民众——“老板怎么安心怎么办”、“老板怎么开心怎么办”。雷人标语的背后，更值得反思的，是地方部门在“比较优势”中削削脑袋朝税收政策“开口子”的惯性。
据统计，2010年和2011年全国因减免税减少财政收入1.63万亿元和1.51万亿元，两年间财政收入减少超3万亿元，区域性税收优惠是这方面的重要原因。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此前更直言，中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区域优惠政策过多，已出台实施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约50项，几乎覆盖

了全国所有省区市。有些地方政府或财税部门执法不严或出台“土政策”，甚至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收，制造政策“洼地”以提升投资吸引力。
为什么“税收优惠”成了人人爱的看家武器？答案有三：
一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税收优惠确实创造过发展奇迹。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到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一系列多样化的特殊功能区，在分享税收红利的同时，确实外向型经济推动了地方快速发展。尝到过甜头，难免容易“上瘾”。
二是税收优惠在招商环境中，属于最可以“偷换”的部分。譬如公共服务水平、交通设施、人员素质等，提升起来谈何容易，

但税收便利是分分钟可以搞掂的事情。
三是税收优惠成了撒泼哭穷后的“糖果”。这些年，但凡发展不好的、需要扶持的、体现关照的，好像都要条件反射似地在税收优惠上分一怀羹。结果，优惠政策就成了唐僧肉，越来越混乱无序。
随着市场机制越发成熟，特殊的财税、土地优惠措施，反而扭曲了市场机制和企业行为，长远而言，也损害公共利益。譬如，出口低报和进口高报，可以使已过期减免税期限的外商投资企业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外资企业借此规避境外税收，地方政府可以将外商投资稳定在本地，却损害了国家的税基。因此，今年6月1日，国税总局已正式实施2014

年减免税统计调查实施方案。财政部针对开发区财税政策执行情况及税收征管质量的专项检查在近两年也在进行，其中，2013年的检查范围覆盖12个省份的62个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一个共识渐次清晰：大尺度的“税收优惠”该清场了。
10月29日，世界银行发布了《2015年营商环境报告》，指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营商环境更成为经济体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座城市，税收便利固然重要，新常态下，更重要的是，还是便利的服务、安全的环境、稳定的政策、公平的法治等环节。地方税收优惠政策退场之后，职能部门也许坐下来想想还能做些什么。



关注“中青评论·海运仓内参”给你好看

评判医改成效

别忘了患者的感受

李劲强

医改五年来，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每年增加超过20%。不过从统计数据看，政府对医疗卫生的巨大投入并未减轻个人的直接负担，个人绝对卫生支出仍在逐年上涨。专家认为，民众一直抱怨的“看病难，看病贵”没有得到实质性缓解。如果医院运行机制、补偿机制没有变，医药费用增长不能有效遏制，那么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依然有限。《经济参考报》12月10日）

以往，很多专家总给人以“砖家”的印象，他们似乎生活在真空中，没有任何生活经验，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虽然这样的“砖家”会被舆论唾弃，但因为这种倾向性发言背后通常有着利益代言和交换，那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专家们并不在乎。所以，当这一次专家能俯下身去，实事求是地对医改效果做一个客观评价时，这种专业与良心当然值得点赞。

其实，对于医改，专家完全可以继续习惯性地纸上谈兵：根据“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2015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将在目前基础上再提高40元，达到每人每年360元以上，这将大大减轻人们看病贵的压力，并有效改善人们的就医环境。这是一种偷懒但又貌似正确的推理，因为医疗投入的确每年都在增加，而且增幅达20%以上，可纸面上的推演在现实中会遇到种种问题，所以最终的结论不能只来自逻辑推理，还需要辅现实调查。这一点，有时也只有专家能查到。

幸运的是，在《医改蓝皮书：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2014-2015）》中，专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关键问题：医疗投入的资金并没有完全惠及居民，在落实过程中，医院、药企成了分得最大一块蛋糕的人。结果，政策红利被利益集团以各种手段与名义“巧取豪夺”，患者个人承担的医疗支出并没有显著减少。这无疑是一种反常，其背后既有一些群体习惯性谋利的冲动，也有制度设计上设计不够清晰的问题。医疗费用的涨幅之所以远远超过物价的涨幅，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药品的销售和采购制度不够完善。

因此，评价医改成效要从个体的视角来看，即改革后个人的医疗负担是否真的减轻——如果减轻，就说明医改落到实处；如果没有减轻，而政策已作出关照，那么一定是政策的执行环节出了问题。此时，可以从如何使个体获利的角度出发，重新梳理政策执行与落实的各个环，看制度是否完善，执行是否走偏，运行是否公正、透明。很多时候，问题之所以久拖不决，根本原因，就在于个体视角的缺失，以及基本评价标准的模糊。

不仅医改成效需要从个体视角来审视，其它改革的评价也是如此。改革必然会影响生活中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其最终目的，不仅仅是实现数字增长，还应该是每一个国民都能从改革中获益。此次《医改蓝皮书》关于医疗投入的评价就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实事求是的态度、个体视角的立场，无疑让我们评价和判断改革效果提供了一个宝贵参考——改革的目的改善与促进每个人的幸福。

何勇海

同一项“世界级选美赛事”，一模一样的比赛名称，却有两家公司争办，而且都称具备授权资格。北京朝阳区法院日前审理的一起选美冠名权之争，向世人揭开选美热内幕：冠以“世界”、“环球”、“国际”的选美大赛不断，打着“世界级”赛事称号，总决赛多在国内外；多国佳丽为冒充，外籍模特跑场赚钱；评选规则有猫腻，赞助商影响比赛结果；空手套白狼，虚构赛事骗商家赞助。《新华网12月10日）

近年来，像“世界旅游小姐大赛”“全球旅游小姐大赛”等五花八门的选美大赛，确实在国内风起云涌，你方唱罢我登场。我国每年举办的选美赛事大小小



吸金

经过连续上涨之后，A股人气被激活，最近不少投资者拿出网贷的钱去炒股或者打新股。专家建议，本着“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投资原则，股票类资产和固定收益类资产都需要合理配置。《新京报》12月10日）
漫画：徐简

网民都是热血的，路人都是冷漠的？

王石川

12月5日下午，在河南南阳通往社旗县的一辆大巴上，22岁女孩刘乐（化名）在车上遭一男子猥亵。在女孩反抗并向司机求救并要求其报警时，司机没有及时施救，导致女孩被犯罪嫌疑人拖下车殴打。日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15天。《大河报》12月10日）
面对别人的不幸，背过脸观上就成了帮凶。当22岁女孩刘乐被5旬男子猥亵时，满车乘客中哪怕有一人挺身而出，哪怕只是断喝一声，歹徒也许会有所忌惮，而不敢那么嚣张——除了猥亵刘乐还抢夺其手机。这一幕，让人想起更令人发指的场景：
2001年，一辆长途卧铺班从川东南与贵州遵义接壤的古蔺县开往广东东莞，车上除了3名司售人员，还载有42名乘客。途中，乘客王善雨兽性大发，竟然如无人之境般，对车上3名女孩强奸5次。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卧铺车上有40多名乘客，

还有司机，竟没人站出来制止（人民网2002年8月1日）。尽管王善雨后被判死刑并领死，但该事件因过于刺激人心而难以平息。
十余年过去，为什么类似事件依然时有发生？
据刘乐称，她被猥亵时“立刻站起，要求司机报警”，但司机没有报警，大巴车一直向前开。司机其实完全没有权力袖手旁观，因为刘乐购票乘车，即已与司机和所属运输公司构成契约关系，而《合同法》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刘乐被猥亵以及遭遇殴打，无动于衷的司机及其所在公司都应承担相应责任。
如此之外，冷漠的乘客呢？有一种说法是，对乘客不读道德谴责，更不能要求他们奋勇，毕竟他们有理由担心被报复，或者一旦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保障？更有人说，保护乘客是政府的责任，最该指责的是政府部门伸手不及时、保障不给力。不能说这些说法毫无道理，但政府再

神通广大，也不可能防范得了所有犯罪；见义勇为流血又流泪的例子，确实也有，但更多的还是见义勇为被褒扬。政府力量触及不到的地方，我们需要抱团取暖。比如在公交车上遭遇了歹徒，保护受害者的第一时刻还得靠我们自己，谁敢担保自己永远不会被攻击？
当然，政府有责任通过更健全的制度设计，激励公众见义勇为，对见义勇为者除了精神层面的嘉奖，更应通过足够丰厚的物质保障，免除其后顾之忧。当正义的力量集聚起来，邪恶就会退缩；当全社会秉承邪不压正、嫉恶如仇的价值观时，那些歹徒生存的空间就会日益逼仄。须知，有时，冷漠与冷血只有一步之遥，而沉默则是冷漠的代名词。
“网民都是热血的，路人都是冷漠的。到底是网民从来不上街，还是路人从来不上网？”有网友如此调侃“键盘党”。我们确实应该有一颗正义的、勇敢的、心，在网上敢于仗义执中，在线下也热血沸腾，何时间何地都不让邪恶嚣张。

某些官员别等到蒙冤时才想起法治

杨涛

从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被抓到“招供”受贿，从一审被判刑11年到重审，从上到上诉到检察院，从等待判决到检察院决定撤职，熊祖模感觉自己近三年来的经历，就像坐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过山车。只是，过山车至今仍未回到原点。三年前被抓时，他是贵州省道真佬族苗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而今，他领着县委副书记的工资，却无班可上。《华商报》12月10日）
“长时间不准睡觉、直面墙壁罚站、不给东西吃，不给药吃，轮流疲劳审讯、用几百瓦大灯烘烤照射、强迫我光脚站地，坐‘铁椅子’、用冷风猛吹（时值严寒）等手段，对我进行长达几天几夜的非人折磨”，这样的“待遇”，竟落在了一个县委副书记身上。
这充分说明，没有法治，没有将权力关进笼子里，滥用的权力同样要威胁到官员自身，因为，面对公权力时，官员也是弱者。熊祖模并非个案，安徽蚌埠市市区（现龙子湖区）原区长助理于英生，

因被怀疑私娼，被有关部门刑讯逼供，还被判处无期徒刑，最终无罪释放，其间遭受的折磨非常人所能想象（新华网2013年12月3日）。滥用的公权真的没有“厚此薄彼”，它对普通公民和官员，都是一场梦魇。如果权力被滥用，那么，官员群体同样没有安全感。
但是，某些官员往往在位时不相信法治，他们更喜欢绝对的权力。他们或指示成立公检法专案组一起办案，或是让政法委组织个案协商，要么就像云南普洱市前市委书记刘培培一样叫嚣“举报人抓了，给他们判刑，抓错的也要抓，判错的也要判”（人民网4月9日）。也有些官员，并没有意识到滥用权力导致的冤假错案。熊祖模说，“我当县委副书记时，对司法机关很相信，也没有关注过冤案。但我自己的遭遇，却让我改观了，后来发现冤假错案很多，只有自身遭受冤枉，某些官员才会感同身受，转而关心法律和别人的遭遇，“至今我都还有考律师的想法。我觉得我国的司法环境很不理想，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学习法律，我可以去帮助蒙冤的人，无偿帮助。”这也算亡羊补牢，但

如果熊祖模在位时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在完善制度和帮助他人方面，肯定更为有力。
不过，即便遭受冤屈，熊祖模仍然愿意为官员而放弃法律维权。他明白，自己可以依法提起国家赔偿，可以追究相关机关和人员的责任，但他又说，只要恢复名誉、安排工作、恢复待遇，他可以放弃追责的权利。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他的选择是明智的，但从社会的角度而言，这样的选择无助于推进法治的进步。一个受到冤枉的官员，仍然不愿意通过法律维权，可见要让官员能真正从内心敬畏法律和为法律而奋斗有多难。
以往有些官员在位时喜欢滥用权力，除了内心私欲膨胀，还有一个原因，即在不完美的制度下，人人都在滥用权力，一个人难以洁身自好。如今，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依法治国”的重大部署，从制度上进一步为官员遵守法律、厉行法治提供了平台和契机，官员就不能再找借口了。别总盯着在位时绝对权力风光的一面——如果法律保护不了普通公民，那么它也难以保护官员。

刘铁男的眼泪为谁而飞

胡建兵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案12月10日宣判，刘铁男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铁男涉案金额3558万余元，他在法庭上为自己的堕落痛哭流涕，还说：“养不教父之过，我把儿子毁了。”（中新网12月10日）
曾引发广泛关注、手握能源重权的刘铁男，落马前以傲慢著称，但此前落马后进入庭审时就曾“痛哭忏悔”，曾在庭审时陈述：“我每每看到起诉书，都在反问我自己，这是我吗？怎么会到今天？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这是哪里呀？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呢？”这次宣判时，他再次痛哭流涕。实际上，在法庭上喜欢痛苦的落马贪官大有人在，如2011年10月，广州中院对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宣判后，李启红当庭哭喊“今天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天”；2010年，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在法庭上痛哭6次；海南新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也曾曾在法庭上哭了3次，边哭还边骂自己“不是人……”古语有云“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落马贪官们在位时一个个往往十分傲慢，怎么一到法庭上就变得那么爱哭了呢？他们的眼泪到底在为谁而流？
很多贪官的眼泪都是为自己而流。刘铁男在法庭的痛哭流涕是为自己毁了

儿子而哭，是为自己失去了自由而泣。刘铁男虽然在最后的自辩环节放弃了自辩，但他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多次为能得到从轻处罚而寻找种种理由，却没有为自己因受贿而使国家和人民财产遭受的巨大损失而真正忏悔。据媒体报道，刘铁男案是一起突出的贪官勾结、官员家属牵涉其中的腐败案件，仅所涉的一起未成功的骗贷，就险些使两家银行和多家国有企业家蒙10多亿元人民币的损失。这样的贪官如果真的有良心，在贪污受贿时怎么不为普通民众想想？
刘铁男贪脏枉法，将家里人都拖下了水，把儿子给“毁掉”了，他为此而痛哭。但是，刘铁男在为自己毁掉儿子而忏悔而痛哭的同时，没有真正为自己所犯下的高污案项目伤害的百姓、被自己毁掉的政府形象而忏悔而痛哭呢？
应该说，落马贪官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平时肆无忌惮，等到了站在法庭上才想起来“哭天喊地”、“痛哭流涕”。庭审流泪的贪官，刘铁男不是第一个，也绝不可能是最后一个。刘铁男为毁掉儿子流下亲情泪，为贪腐行为流下悔恨泪，为自己的脸上落下羞愧泪，可眼泪无法弥补其所犯之罪，眼泪只能警醒某些腐败官员——若不悬崖勒马，最终只会落得同样下场。

欣闻嗜赌官员被中纪委通报

严辉文

日前，中央纪委首次“批量”点名通报了参赌涉赌干部：重庆市沙坪坝区山洞街道党工委书记郭卫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正处级检察员张宝仁、江西省南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曹志刚、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水务局局长周刚、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国土资源分局副局长李开勤、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第三机床厂厂长盛浩民。（《新京报》12月10日）
地方官员嗜赌，由中央纪委点名通报，这一新举措表明了中央严肃纪律、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决心。一些官员嗜赌，已成为官场上由来已久的公开的秘密。官员嗜赌，撇开官员本人素质不高、不爱学习、不热爱工作不说，也不离开其中个别官员胆大妄为随意提取各类公款参赌无法纪意识不说，似乎公务员严禁赌博的明文规定之类，从来没有成为这个群体操行评价的硬杠杠。
某些地区的官场歪风显示，在某些圈子中，评价官员是否嗜赌，似乎与评价官员是否喝酒有得一比。那些热衷嗜赌者，不仅没有得到负面评价，甚至还

可能因此拿到“投名状”，赢得当地官场较高的满意度。而不精此道者，又正如不喜饮酒的干部一样，在时一时一地，说有打入另册的风险，也毫不为过。
嗜赌官之意不在赌，在乎拉帮结派。为了维系赌友之间的“感情”，嗜赌之间又难免结成利益共同体，而一个相对稳定的朋友圈，对一个地方官场生态的侵蚀总是显而易见。最为直接的伤害就是，他们可能利用赌博机会搞定一些人物、摆平一些事情，甚至让不该提拔者得到提拔，让不堪重用者受到重用。
实现“贿赂便利化”后，以打牌为掩盖，行贪腐受贿之实，时下早已不鲜见。这大约也是一些土木不正者“智慧的结晶”。在反腐的严峻形势下，行贿者不好直截了当地送财物，受贿者也不方便伸手去拿脏款，似乎赌博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桥梁和纽带。送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出去了，收的人再多也敢拿，还不免津津乐道地炫耀。
如今中央纪委点名通报嗜赌官员，对他们是一次当头棒喝，不只有利于管住嗜赌官员的私欲，也意味着“赌风污染政风”的局面有望得到破解。

有一种吃空饷叫“长期值夜班”

吴应海

12月8日，有读者反映，称陕西省丹凤县园林绿化管理所3名职工入职两年多，未见他们上过班，其中一人人为丹凤县林业局局长马某家属。对此，该所回应称，这三人是公益性岗位招聘的工作人员，长期值夜班。丹凤县纪委称将调查此事。（《华商报》12月10日）
所谓吃空饷，就是只拿薪水不上班。在举报者看来，凤县园林绿化管理所这三名职工，入职两年多没见过他们到所里上过一天班，干过一天活，却一样按月领工资，这明摆着就是吃空饷，所以才愤而举报。但据管理所领导辩称，这3人上的是夜班，纯属一场误会。想想也是，既然值夜班，白天休息，晚上才出来巡查道路设施，那同一单位的员工当然看不见他们忙碌的身影了。
问题是，如果这三人的确是在上夜班，那单位为什么不早点大大方方地公之于众呢？长期值夜班绝对是一件辛苦的事，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甚至应该填补。

和白宣，直到有人举报才“抖”出实情呢？这是不是不太正常了？还有，按照该管理所负责人的说法，这3人一周来单位汇报一次，平时如果发现可及时电话联系，既然每周都需要来单位汇报情况，为什么其它职工一点不知情呢？两年多来他们打了多少个电话汇报工作？都是打给谁的？什么时间打的呢？
根据绿化管理所负责人的介绍，这3人值夜班的平均上班时间是5小时，也不用到单位报到，按照划片区管理，每名值夜班人员负责各自片区夜间巡查。至于这些人到底有没有真的履行工作职责，由于没有人监管，谁也不知道。这样的工作模式，上班可来可不来，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与吃空饷何异？
其实，真要查清真并没有多难，现在街头巷尾探头多多，你说天天去上班了，走的什么路线，调一下视频就全清楚了。还有，这三人的身份特殊，一人为局长夫人，两人是被开除的公安干警，他们当初怎么进的园林绿化管理所，也须一并说明。

“选美经济”不能只见美女不见监管

超过100个，“选美热”一浪高过一浪。随着“选美风”愈刮愈烈，获奖选手却被公众批为“越选越丑”、“滥选充数”。如果此前，你还以为是美女资源被消耗殆尽了，那你就错了，上述新闻告诉了我们真相：那些多国佳丽原来是冒充的，一些选手获奖原来是买来的。
如果把层出不穷的选美大赛，当作“利益”来开发的话，如此开发出来的“选美经济”，也是不道德的经济。要知道，当选美大赛可以不选出真正的“美”，能够花钱买到冠军季军，就会被污纳垢，潜规则横行，比如以权色交易、权钱交易兑换名次，有些选美大赛甚至沦为给赞助商等有闲人赤裸裸地选“二奶”。
沦为“选秀大赛”的选美大赛如若越来越多，中国的选美赛事能否健康、稳健

地走下去，就会成为让人忧心的问题。把选美大赛当作纯粹的赚钱生意做，或者当作消费女性美丽的“盛宴”做，选美大赛的质量、公信力和社会效益显然堪忧。事实上，正规的选美大赛，对一家企业乃至于一座城市经济带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这取决于选美大赛的公信力、认可度。将赛事尽量办得专业化、公平化，方才不会偏离正确轨道，否则就会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选美赛事的主办方自我毁灭，倒也是市场淘汰的结果。其操作的“选秀大赛”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不容忽视，比如选美佳丽“没有最丑，只有更丑”，靠脱衣上位、性感诱人，不仅是“劣币驱逐良币”，对真正的美女不公，而且会误导社会大众的审美情趣。一些人一味迎合低俗

审美，还会导致一些女孩为争奖不择手段，全然忘记了女人再漂亮也需要个人努力奋斗才能出人头地。如果此类选美活动与地方政府的这节那节有关，还会让政府部门蒙羞。
因此，“选美经济”不能只见美女不见监管。有专家说，选美大赛的主管部门，主要是文化稽查和工商部门，但因责任不明确，管理存在很大漏洞。也有专家说，我国对选美大赛并无明确的主管部门，监管职能是涉及哪个部门的业务就向哪个部门报批，需要宣传时要向工商管理部报批，需要邀请艺人演出时则要向文化部报批，但选美比赛自身是否合法合规、承办单位是否具有相应资质，没有明确规定。这些漏洞亟待填补。